

康德时间困境及杜威的实验主义破解

钱晓东 陈亚军

内容提要 康德的时间是先天的观念法则,它使力学和纯粹数学的先天综合判断都成为可能。前者是先验阐明的直接目标,后者以形式为认知对象,为所有先天综合判断的可靠性奠定基础。时间直观是感性规则,为力学提供先验阐明;时间图型是知性规则,范畴通过它思维现象,为力学提供先验演绎。它们共同使力学最终建立,无需设立“框架-能力”模式。从杜威视角看,困境产生于过度强调先天性:变化不是质的改变,没有时间性;先天形式并不属人,使内感官缺失;时间作为严格法则无法应对变化情况,不会取得实践上的成功。实验主义将时间改造为操作上的理智工具从而破解困境:时间观念用于变化;个体通过时间筹划和创造,体现出内感官性;实验主义规则追求高的盖然性,更能获得实践上的预期后果。

关键词 杜威 康德 先天形式 实验主义观念论

钱晓东,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210046

陈亚军,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310007

康德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将时间当作人自身的直观形式,以此回答了纯粹数学和力学“何以可能”的问题。它一方面是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另一方面也为它们的合法性进行奠基,因此是康德先验理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后来的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叔本华、柏格森、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哲人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另一方面,康德时间观也存在争议。邓晓芒先生认为它有两个困境:(1)先验阐明困境,即时间的“先验阐明”^[1]应该使算术的先天综合判断成为可能,但在正式论证时却和力学对应;(2)框架-能力困境,即同一个先天感性直观既是主体的能力又是先天的形式框架^[2]。(1)是(2)的表现,(2)是(1)的根本原因。康德在正式对时间进行“先验阐明”时是和力学对应的,但在别的地方(《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又和算学对应,这种两可的先验阐明表明康德对时间有一种“根本性的”^[3]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实用主义研究”(14ZDB022)阶段性成果。

[1]“先验阐明”指“将一个概念解释为一条原则,从这条原则能够看出其他先天综合知识的可能性。”(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2][3]邓晓芒:《康德时空观的困境与启示》,[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两可的理解。邓先生没有指明应该如何解决上述两个困境,只是强调其“启示”,没有解答时间直观到底为算学还是为力学提供了“先验阐明”的问题。

换言之,根据邓先生的思路,在困境(1)中康德并没有明确回答出纯粹数学和力学“何以可能”的问题,这岂不有损《纯粹理性批判》(该著作就是回答知识何以可能的)的价值?在困境(2)中邓先生认为康德将时间理解为形式框架是为了迎合牛顿力学,理解为主观固有力量是为了坚持先验唯心主义立场。那么,“迎合”意味着康德时间观仅仅是一种随波逐流的学说,坚持唯心主义立场表明它和自然科学是脱节的。既然如此,邓先生在批评斯密“小看了”康德的同时,对作为启蒙孀子的康德和作为“哥白尼式革命”、为科学奠基的康德学说如何评价呢?由此可见,这两个“困境”是值得商榷的。

不过另外,依杜威看来,康德的时间形式,连同空间和范畴一起,致力于追求绝对确定性,过于刻板 and 僵化^[1]。在一个开放和多变的时代,这种方法会导致时间性和个体性缺失、不能用于实际行动等困境。实验主义的任务就是以新的观念取代先验的唯心主义来破解这些困境。

一、时间的规则性与“两个时间困境”分析

康德将时间定义为先天(a priori)直观(anschauung)形式。所谓形式,是指“使得现象的杂多能在某种关系中得到整理的东西”^[2]。康德还对时间进行了“形而上学阐明”:

在这一先天必然性的基础上,还建立起了时间关系的那些无可置疑的原理、或一般时间公理的可能性……这些原理不可能从经验中引出来,因为经验既不会提供严格的普遍性,也不会提供无可置疑的确定性。我们就只能说:通常知觉告诉我们是这样;但不能说它必定是这样。这些原理作为使经验成为可能的诸规则而起作用,并在经验之前教导我们,而不是通过经验教导我们。^[3]

可以看出,先天和经验(experiece)是相对的,指的是普遍性和确定性。时间是“使经验成为可能的诸规则”,因此质料实际并不是“在(in)”时间中,而是“依照(according to)”时间得到整理和确定,由这一点才能够看出其他先天综合知识的可能性。同时,时间作为规则只能规定现象,而不是物自体,因而是感性规则。“有关感性的先天原则的科学”^[4]就是先验感性论。

另外,康德还强调时间是“先验(transcendental)的观念(ideal)性”和“经验的实在(concrete)性”的统一。经验实在性“即对每一次可能给予我们感官的一切对象而言的客观有效性”^[5],意味着时间规则在规规定经验方面是客观有效的。而为了有效地规定经验中的现象,法则须预先完善,这就是先验观念性——“凭借理性就它们自身来考虑、即没有顾及到我们感性之性状的事物方面”^[6]的观念性。确定和可靠的东西必须从先天理性中寻找。这就好比为了有效治理国家,需要先制定完备的法律,但这样的法律不能从实际社会生活中产生,而必须来自既定的威权一样;反过来,预先制定的良好法律则必定在实际生活中有效。

综上所述,康德的时间形式不是“形式框架-能力”,而是普遍确定性的规则,是人类理性的禀赋。这样的理解是分析两个困境的前提。

[1]John Dewey, “Germany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in Jo Ann Boydston (ed.), *The Middle Works*, Vol. 8,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59.

[2][3][4][5][6][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第35页,第26页,第38页,第32页。

1. 先验阐明困境不成立:时间“先验阐明”使纯粹数学和力学皆成可能

根据时间规则,各项运动的关系能够被确立。借助时间,运动才是确定的,力学知识才成为可能。于是“变化的概念以及和它一起的运动(作为位置的变化)的概念只有通过时间表象并在时间表象中才是可能的;……使一个变化的可能性、即把矛盾着的谓词结合在同一个客体中的可能性(如‘同一个事物在某处存在又在同一处不存在’),成为可理解的。只有在时间里,两个矛盾对立的规定才会在一个事物中被发现,即前后相继地被发现。所以,我们的时间概念解释了像卓有成效的普遍运动学说所阐述的那么多的先天综合知识的可能性。”^[1]可见,康德在时间的“先验阐明”中是明确强调时间使力学成为可能的。

当然,运动的过程依靠现象本身是无法表达和界定的,于是就需要将它们分解成为在计算中数量的陈述,就需要一套关于数量的知识即算学,它由时间产生。“算学是在时间里把单位一个又一个地加起来,用这一办法做成数的概念。”^[2]

当数的概念做成后,“纯粹数学能以其全部精确性应用于经验对象之上”^[3],运动可以用表现为数学方程式的各种函数表现出来,并以相互等量的定式予以确定。因而,“运动供给现象以一些可以进行数学推理的特性,而这种数学推理是可以揭示内在特性的。……一切所观察的事物都要在数学上符合由时空数理所规定的特殊规格”^[4]。

因此,时间使力学和算学都得以确立。康德并没有使时间的先验阐明跳过算术而直接过渡到力学,并没有忽视算学。相反,他极为看重它的作用,认为算学是所有知识的基础:

纯粹数学在几何中处理空间,而纯粹力学处理时间。属于这些的是一个这样的概念,它本身取决于知性概念,但它的具体的实现却需要借助于时间与空间的概念(借此多个东西才前后相继地和同时并存地被提供出来);这就是算术所处理的数的概念。既然纯粹数学所处理的是我们的全部感性知识的形式,所以它是任何感性的和清楚的知识的工作,而由于它的对象不仅仅是一切直观的形式原则,而且甚至就是本源的直观,所以它就提供出最真实的知识,同时为一切知识提供出最高确定性的楷模。^[5]

“纯粹力学”指数字在力学中对时间的运用。由于数字并不问性质上的差别,这使它能够被自由地运用,而不为特殊情境所拘。比方说,A到B的距离是数字在几何中的运用;而如果由A运动到B,那么同样的数字则成了在力学中的运用;“属于这些的”指属于空间和时间的感性经验;“它本身取决于知性概念”是说经验领域由知性概念即范畴决定;“但它的具体的实现却需要借助于时间与空间的概念”是说由于范畴和知觉之间需要时间作为中介(图型)^[6],范畴只有在时间中才能对经验产生作用^[7];

[1][3][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6页,第157页。

[2][德]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2页。

[4][美]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傅统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

[5]转引自邓晓芒:《康德时空观的困境与启示》,[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6]关于图型:“一种先验的时间规定就它是普遍的并建立在某种先天规则之上而言,是与范畴(它构成了这个先验时间规定的统一性)同质的。但另一方面,就一切经验性的杂多表象中都包含有时间而言,先验时间规定又是与现象同质的。因此,范畴在现象上的应用借助于先验的时间规定而成为可能,后者作为知性概念的图型对于现象被归摄到范畴之下起了中介作用。”([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页)

[7]严格说来,是范畴通过时间和空间两种形式对经验产生作用,不过由于静止是运动的一种特殊状态,因此空间是纳入时间之下的,为方便起见,这里可以仅提时间。康德的时间不是空间化的时间,相反,空间是时间化的空间。这一点也可以由这一段话看出来:“时间是所有一般现象的先天形式条件。空间是一切外部直观的纯形式,它作为先天条件只是限制在外部现象。相反,一切表象……属于内部状态,而这个内部状态却隶属在内直观的形式条件之下,因而隶属

纯粹数学将两种形式作为对象,运用数理将直观清晰地表达,因而是“任何感性的和清楚的知识的工作”,就像法律必须以条文的方式界定一样;而这两种形式“不仅仅是一切直观的形式原则,而且甚至就是本源的直观”,是所有知识的基础,对它们准确清楚的表达和界定,就使所有知识在一开始就可靠和有效,因此纯粹数学能够“提供出最真实的知识,同时为一切知识提供出最高确定性的楷模”。

由此可见,在先验阐明问题上,康德的思路是清楚的:纯粹数学依据在时间里把单位一个又一个地加起来做成数的概念,力学依据时间前后相继性做成运动概念。“一个又一个加起来”和“前后相继”都是时间直观的特性,它们分别为算学和力学提供了“先验阐明”。其中力学是直接目标,而算学虽由时间产生,但反过来以时空形式为认识对象,进而为所有先天综合判断可靠性奠定基础。

2. 框架-能力困境不成立:无需对时间进行“框架-能力”式理解

接下来,我们由康德和牛顿时空观的关系考察困境(2)。

在牛顿力学中,作为某种实在的东西,空间是一个箱子,为物体提供了存在的场所;时间是一条流动的长河,用来测量物体在空间中的运动。康德认为这种观点“长处是,他们为数学的观点打开了现象的领域。但当他们的知性想要超出这个领域时,他们反而恰好被这些条件弄得混乱了”^[1]。由于绝对的时空构建起一套坐标系,在其中的物体的运动状况可以用数字描述出来,它们在这一套坐标系中的位置是可以记录的,这就是“为数学的观点打开了现象的领域”。

但是另一方面,运动诸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却不能依靠时空把它们包含在里面来确定,而必须在直观的基础之上、在知性领域运用概念。“所以直观和概念构成我们一切知识的要素,以至于概念没有以某种方式与之相应的直观,或直观没有概念,都不能产生知识。”^[2]前者是一种接受性,即感性;后者是对“感性直观对象进行思维的能力”^[3],是知性。绝对时间只能接受现象,但无法确定现象之间的关系。

但先验时间却不然,它能同时满足直观和概念两个条件。先验时间首先接受现象,这是直观的一面。另一方面,在知性领域,由于“诸现象必须不是径直被归摄到诸范畴之下,而只是被归摄到诸范畴的图型之下”^[4],范畴只有通过时间才能处理现象,因而时间作为图型也是知性规则,满足了概念条件。

就力学而言,认知首先直接面对的是运动着的感性对象,它们及其数理表象按照感性的时间规则直观地被接受,这是时间的“先验阐明”,但是在这个阶段,直观还无法对对象的运动进行思维,时间作为图型恰好扮演了概念角色,起到思维作用。“诸现象的存有唯有通过知性的规则才能按照时间关系得到综合的统一,这种知性规则给每个现象规定了它在时间中的位置,因而是先天地并且对一切时间和每个时间都有效地作这种规定的。”^[5]这是时间为力学提供的“先验演绎”^[6]。所以,对力学何以可能的回答,是通过两步完成的:首先,时间作为先天直观形式接受对象,这是先验阐明;然后,时间又作为图型将对象纳入知性之中,范畴通过其图型对这些对象进行思维。最终,这两步建立起力学的先天综

在时间之下,因此时间是所有现象的先天条件,……是内部现象(我们的灵魂)的直接条件,正因此也间接地是外部现象的条件。……所有一般现象、亦即一切感官对象都在时间中,并必然地处于时间的关系之中。”(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也就是说,时间涵盖了空间。

[1][2][3][4][5]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第51页,第52页,第169页,第195页。

[6]关于先验阐明和先验演绎的关系:“这两个称呼本质上是一回事,只不过在感性论中先验演绎是通过直观直接呈现出来的,用不着逻辑推断,所以只须‘阐明’就行了。但范畴却没有这样的便利,它只能通过‘演绎’间接地证明其客观有效性。”(邓晓芒:《康德时空观的困境与启示》,〔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就力学而言,在感性论中对其“何以可能”的回答是“阐明”,在知性论中就是“演绎”。

合判断,它们共同使力学作为纯粹自然科学成为可能。没有阐明的演绎是空洞的,没有演绎的阐明是盲目的。

同时不难看出,邓晓芒先生所说的那个“充当容纳一切内部和外部(空间)现象的最终的天条件”^[1]的“框架”,不过是被先验阐明的直观时间,而“体现出自在之我刺激自己内心的能动性”^[2]的“能力”亦是先验演绎的图型时间。它们并不是“根本性的”两可理解,而是力学何以可能解答中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所以“时间规定的这种统一性是彻底地力学的”^[3]。因此,也就无需对时间进行“框架-能力”式理解,以便一边“迎合”牛顿机械论,一边“固守”自己的先验观念论立场。实际上,唯心主义是机械论合法性(何以可能)的依据,而机械论所取得的成就是唯心主义有效性的验证。因而,“康德深信他的主张……是受牛顿物理学所支持的,而且也是为那个物理学奠定坚实的基础所必须的”^[4]。

二、杜威理论中康德时间观的真正困境:过度强调先天性

综上所述,时间为力学奠基,同时也表明了它对经验的规定作用。因为尽管范畴统治经验,但经验并不直接面对范畴,实际统治经验的是时间。这就是范畴“经验的类比”:

我们的这些类比真正体现了一切现象在某些指数下关联起来时的自然统一性,而这些指数无非是表达了时间……就其把一切存有都包括于自身中而言……的统一关系,这种统一只有在按照规则的综合中才能发生。^[5]

由此可见,尽管经验事实混乱不堪,“但总有一种统一的形式会将它们纳入麾下”^[6]。这就是时间,它能够“对感觉材料进行整理,由此而为自然进行立法;但它本身是高于感觉和自然的,就像君王高于臣民一样”^[7]。时间最终成了经验的统治者。

然而,从杜威的实验主义视角来看,时间的这种统一性作用只能适用于一个如同詹姆斯所说的“块状宇宙(Block universe)”,这是一个机械论的封闭世界,也是牛顿力学所处的世界,康德的唯心主义为牛顿的机械主义奠基就在于他也在坚持这个宇宙(因而困境才不会产生)。但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任何想象、冒险和创造的余地,因为在这里,昨天、今天和明天一样。强调时间观念的先天性,实际是在坚持一种一元论和决定论的哲学。这种哲学超出这个世界,就是过度强调先天性,就会产生困境:

首先,过度强调时间的先天性实际上排除了时间性。先天时间观把一切都看作是既定的,所谓变化仅仅是某种已经事先存在事物的再分配和再编排,一切过程都只不过是按照一个预先确定了的计划展开^[8]。它用一套本身完善的力量进行认知,并一劳永逸地作用于事先存在的外在材料,无需新的目标,无需改变,无需有所作为,有的只是纯理性的辩证运动。在这一切永恒不变、停滞不动的永恒

[1][2]邓晓芒:《康德时空观的困境与启示》,〔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3][5][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页,第195页。

[4][美]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傅统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页。

[6][7]John Dewey, "Germany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in Jo Ann Boydston (ed.), *The Middle Works*, Vol. 8,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9, p.158, p.149.

[8]比如对于社会历史:“一种造物的所有禀赋都注定有朝一日完全地并合乎目的地展开;……人们在宏观上可以把人类的历史视为自然的一个隐秘计划的实施,为的是实现一种内部完善,并且为此目的也是外部完善的国家宪政。作为自然在其中能够完全发展其在人类里面一切禀赋的唯一状态;……按照自然的一项以人类中完全的公民联合为目标的计划来探讨普遍的世界历史,这样一种哲学尝试必须被视为可能的,甚至是有益于这个自然意图的。”〔德〕康德:《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36页。

下面实际没有时间可言。相信先天的必然性,实际上是把时间排除在外,否认了时间的真实性,因为它不相信有必然性以外的可能性,于是就拒绝了试验和调整,也拒绝了个体的独一无二性和创造性。先天形式机构中并“没有任何外表的、可以观察到的或有时间性或历史性的东西”^[1]。

其次,过度强调时间的先天性也取消了时间的内感官性。康德通过“哥白尼式革命”将神权转化为人权,人因此而成为自然的立法者,他拥有一个确定的形式——内感官,内感官“规定着我们内部状态中诸表象的关系”^[2]。因而,人是拥有灵魂和自由意志的主体。但在杜威看来,“康德的所谓革命不过是使得早已隐藏在古典传统思想中的东西明显化罢了……知识是受宇宙的客观组织所决定的。但是只有在它假定了宇宙本身是按照理性的模型而组织成功的这种主张之后才这样断言。”^[3]因此,理性是先于人类存在的^[4],所谓“哥白尼式革命”只不过是先天理性借人对自己的显现。“有理性的东西”(das Vernünftige)只不过是先天理性的宿主,是一个空洞的抽象,他并不规定自己的内部状态,因为时间没有进入他的存在,这种内部状态并不属于他自己。

况且,既然一切都是既定的,预先早已严格确定,那么一切就只是按照理性最初的设计顺其自然、按部就班地展开,这其中并没有个体的主体性角色存在,个体既不能、也没有必要规定自己,他并没有筹划自身的能力。“于是,时间不再是个体存在的构成要素。”^[5]

第三,先天观念并不能一劳永逸地对经验世界进行规划和决定。根据康德的观点,经验世界是繁纷芜杂的,但得益于时间形式,一切事件都能够被精确地排列为稳定坐标系上的节点,而人类俯视着它,对它一览无余。顺着这一信条,“认识到现有物体的位置与速度,也就能够准确预测到全部物体的运动状态”^[6]。既然一切都成竹在胸,未来可以由过去和现在逻辑地推出,那么在行动上心想事成、水到渠成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然而,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与否,一方面取决于主体的规划和努力(而且主体会有多种规划方式、不同程度和方式的努力状况),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所遇到的环境或条件(而且环境条件丰富多样并且变化多端)。任何有目的的行为“既不能忽视作为机遇的环境或条件,也不能遗漏个体回应这些环境和条件的独特方式。……对事件的回应并不是某个原因的必然结果,而是一种把这一事件变成正在形成的独特历史的一部分的方式”^[7]。而先天观念论却否认和漠视这一切。它与其说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不如说只是为了满足情感的需要。它致力于将自己的情感和愿望理想化,以致超越了观念对现实的实际影响,也就不能对实际生活产生有效的作用。

三、杜威对康德时间困境的破解——实验主义观念论

由此可见,康德时间困境的根源在于其强调先天性。观念不会产生时间困境,因为时间本身就是观念、或者说意识。时间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对自身存在的领悟、反思和筹划(从而也就产生了关于变化和数的意识),是“纯粹自我激动”^[8]。“此在(即人——笔者注)中的存在领悟仿佛是自发地把存在放到时

[1][3][美]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傅统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页,第289-290页。

[2][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4]亦即“不变规律、永恒原理、观念范畴……先于生动活跃的人而存在;……这些规律、这些原理、这些范畴自古以来就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页)

[5][6][7]John Dewey, “Time and Individuality”, in Jo Ann Boydston(ed.), *The Later Works*, Vol. 14,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12, p.106, p.111.

[8]海德格尔:《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转引自邓晓芒:《康德时空观的困境与启示》,[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间上来筹划”^[1]，由此才会产生时间。时间只是人的时间，因为只有人才进行自我领悟和筹划。我们认为时间是外在于我们的东西，是“流俗的时间”^[2]，那是因为我们缺乏自我意识，缺乏主体性或个体性。

有鉴于此，杜威并不否认观念，但明确反对纯粹观念和纯粹理性这样（先天性）的东西^[3]。他主张“用操作来界定观念，而决定这种操作的并不是什么先验的验证或规则。这些操作本身就是在实际探究进程中通过实验发展出来的。这些操作是从人类的自然动作中创造出来的，也是在做的进程中验证和改进的”^[4]。观念是从经验中产生出来的，并且运用于经验中的操作。它的“主动力量是实在的，但是必须在具体经验的情境中才具有操作上的力量”^[5]。观念是假设性和实验性质的，是和实际经验的需要联系着的，追求的是高的盖然性（probability），而不属于抽象的理性，也不具有严密的决定性和必然性。观念是为了将有问题的情境——我们生活面对的困惑、困难、危险等等——转化为确定的情境，使问题得以解决。认知的任务就是使当前的世界变为我们需要的世界，“把紊乱不定的情境转变成更加在控制之下和更加有意义的情境”^[6]。

作为观念，杜威的时间是假设性、中介性、可控制、可实验和可调节的思想手段，考虑的是如何设计一些操作来改造经验对象，是怎样有意识和有目的地重新编排和处理事情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时间所做的事情正是思维和一切思想对象所必须做的事情：它们通过适当的操作把个别观察和个别经验的不连续的情况联合起来，成为彼此连续的东西。”^[7]

如同先验的观念论是时间困境的根源一样，实验主义观念论是对该困境的破解。

首先，时间的观念性标志着，通过运用观念和思想，经过有意识和积极的行动，现象发生了改变，成为经过改造的对象，新的关系和意义通过时间产生出来。而时间也就在经验的实际后果中得到检验，从而确定它实在的地位。时间由既定的计划转变为主动地调节着的变化，成为一个和发展变化，对未来的预知、筹划、创造联系在一起的概念。它不再是预先植于人心中的先天直观，以之一劳永逸地规定经验世界，而是在经验过程中“个体作为个体的存在，是创造，是不可预知的新生事物的发生”^[8]。它真正令人惊奇之所在不是它的绝对确定性，而是“存在得以真实而又不可预知地真正生长，是实验与新奇的出现”^[9]。没有有待改变的事物关系的多样性，没有改变，没有主体在思想中的主动调节和创造，就没有时间出场的必要。

其次，对于个体来说，时间还意味着，认知者的角色由一劳永逸的计划者、理性在人世间的代表变为积极创造和变革的当事者。随着这种转变，他们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可能，拥有多样性选择的自由，他们能够在主动地调节、试验和创造过程中不断壮大提升自身，日益展现出自己的主体性（subjectivity）。时间关乎的是主体的潜能，而“潜能是一个存在范畴，只有个体在一定时间内拥有潜在的力量与能力，发展才能发生”^[10]。只有时间真正融入到个体的存在，人才能从自己、“从人的此在有限性这

[1][2]海德格尔：《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转引自邓晓芒：《康德时空观的困境与启示》，〔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3]John Dewey, “Germany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in Jo Ann Boydston(ed.), *The Middle Works*, Vol. 8,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9, p.141.

[4][5][6][7][美]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傅统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页，第144-166页，第298页，第144-146页。

[8][10]John Dewey, “Time and Individuality”, in Jo Ann Boydston(ed.), *The Later Works*, Vol. 14,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12, p.109.

[9]John Dewey, “Philosophy and Democracy”, in Jo Ann Boydston(ed.), *The Middle Works*, Vol.11,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2, p.50.

一根据出发的存在领悟必须把自己放到时间上来筹划”^[1]。反之,如果“把个体性看成既定的东西,个体性就这样从时间中抽象出来,不再是一种发展的能力”^[2]。既然个体自身没有发展能力,那就不得不依靠外在的权威,变成外在和异质的。

最后,实验主义的时间作为观念并被运用,表明它也是一种法则^[3]。但和先天法则的严格性不同,“法则乃是预测可观察事变概率的公式。这些法则所表明的乃是许多关系,这些关系十分稳定,足以在特定的概率限度以内来预测个别情境的发生”^[4]。概率是一个统计性意义上的概念,而统计性是一种关于可能性的表述。举例来说,没有保险公司能够预测一个人什么时候生病或死亡,或者一栋建筑什么时候着火。保险的实行依据某种观察:在某个人群中,百分之几的人会多活一年,百分之几的人会多活两年,等等。以这些统计数据预测未来发生的可能性情况并以此调整保险费。这种知识研究的是某种事件在所有事件中发生的频率,它比逻辑地预测未来要可靠。没有那个保险公司会运用“纯粹”的数学进行经营——其和可能出现的概率事件完全脱节。“因为这个原因,可以放言统计学说将最终取得胜利。”^[5]这也说明,作为经验观念、寻求可能性和概率的法则要比作为先天观念、追求绝对必然性的法则更能获得实践上的成功。

康德和杜威两种时间观的不同,源于两者对观念的看法不同:康德的形式不是假设性质的和有条件的,而是唯我独尊的,它们不需要用后果对它们加以区别和验证,它们自己就是法则。康德确立这些概念形式的理由是为了保证获得普遍性和必然性,而不是为了获得假设和盖然性。这种靠纯心理的方法在认识上去寻求绝对的确定性的方法业已被废弃了,代之而起的是靠主动调节条件来寻求具有高概率安全性的方法。要明确步骤用以调节变化、获得安全,而不是从不可变化的东西中去求得绝对的确定性。要把判断的标准从依据前件转变为依据后果,从无生气地依赖过去转变为有意识地创造未来。所有这些都是时间在时间中进行创造性发展和通向崭新的更好未来的重要源头。

[责任编辑:洪 峰]

[1]海德格尔:《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转引自邓晓芒:《康德时空观的困境与启示》,[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2]John Dewey, “Time and Individuality”, in Jo Ann Boydston(ed.), *The Later Works*, Vol. 14,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13.

[3]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中的一个例子颇能说明康德和杜威法则观的不同:一群小学生被老师要求从0开始不断地加2,当加到1000后,学生们开始将被加数由2变成4。老师告诉他们应该加2,他们回答:“以前的规则是加2,现在则应该加4”。这个故事意思是,加2是一个预先和既定的规则,和康德类似。而后来的规则是经验中产生的,是可以改变和调节的,是实验主义式的。

[4][美]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傅统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页。

[5]John Dewey, “Time and Individuality”, in Jo Ann Boydston(ed.), *The Later Works*, Vol.14,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06.